

激活农村大市场要注重乡村塑魂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物质层面的塑形任务,也必须有精神层面的塑魂要求。推动乡村振兴与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互为补益、良性互动的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奠定了更加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农村地区进一步落地生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文化保障。

□郑永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追求,使这些价值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实施过程,能在“凝心聚力、引领认同、化解矛盾、文明乡风”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凝聚共识,整合多元主体。推进乡村振兴涉及不同实践主体和利益主体,在协同多元主体、整合多样利益时,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的作用,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不同的参与主体制定统一的价值标准,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通过整合多元主体的价值诉求,达成价值共识,引导他们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局中成为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增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内在驱动力。

通过引领认同,减少施政阻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引领农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抓手,也是促进传统文化认同、民族历史认同、社会道德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广大农村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深化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提升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同,从而使乡村振兴相关方针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易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信任成本,减少实际工作层面的阻力。

通过化解矛盾,确保有序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点,城乡结构深刻变化、经济体制持续变革、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秩序的具体矛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调节农民的情绪情感,提升个人及群体的思想境界。在实践中能够防微杜渐、正本清源,助力农村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的形成和有

效运作。

通过文明乡风,提振文化力量。新时代乡风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思想理念、道德伦理、价值追求为内容,以守护文明乡风、维护良好家风、保护淳朴民风为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改善农民精神风貌、理顺农村社会关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等方面影响乡村振兴的现实进程。

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展开部署,实施乡村振兴能够在现实层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培育与深入践行,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乡村振兴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服力。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要求,是提升农民

增收能力,实现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只有让农民腰包鼓起来,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提升,才能使他们深信党和政府所倡导弘扬的价值主张。

乡村振兴进一步优化治理基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公共福利是否实现增长,现实困难能否得到解决。推进乡村振兴就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最现实、最迫切的需要出发,在切实为“三农”办实事、解难题、谋发展的同时,增进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信心。

乡村振兴进一步筑牢制度基础,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观念形态,需要通过具体的政策、制度、法规来落到实处。乡村振兴战略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与现实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展开过程,作为理论载体能够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解释力、现实影响力;作为制度载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制度性安排,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乡村振兴进一步拓展实践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需要不断丰富其内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场新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对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同时也提供了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实践经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观察与思考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变化新趋势

□吕德文

农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现阶段,我国人口形势出现了新变化,这将对农村造成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在新背景下进行新讨论。笔者认为,建立“稳定器”主要通过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构筑“蓄水池”则主要依靠为人口再生产创造保障条件。

相比城镇,农村人口形势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于城镇。2023年春节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新浪微博开展了大规模互联网问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各调查5万居民。调查数据显示,在乡村社会,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调查者占比超过40%,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悬殊;在低生育意愿群体中,无生育意愿的在乡村占比只有24%,而这一比例在城市高达31.7%。这说明,当前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还比较平缓。

另一方面,农村出现人口

流失的趋势其实来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经达到65.2%;相比之下,农村人口从1995年达到峰值8.6亿人,随后开始发生逆向变化,直到2022年降至4.9亿人,减幅达到43%。有学者概括,流动人口呈现典型的“三个八”特点,即80%以上人口来自农村,80%进入城镇,80%是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更为严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现象更为明显。这种复杂的人口形势使得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进一步凸显。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城镇化有典型的渐进特征,即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取得一定成就,有了经济社会基础后才在城市安家。这一部分进城农民往往是农村精英,规模也有限。但最近十年左右,普通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年轻人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也在短时间内进入城市生活。在笔者调查的很多地区,有一套城市商品房是缔结婚姻的前置条件,男方提供20万~30万元的彩礼也是普遍情况,两者加起

来不是个小数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父母为年轻人购置住房、提供彩礼,是财富的代际转移,是年轻家庭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年轻家庭再生产的门槛迅速提高。一些农民家庭通过延长父母的代际责任来解决年轻人的生育问题,如父母得为年轻人带小孩,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一旦农民家庭无法解决城市生育所需要的条件,生育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客观上,当前普通农民家庭只有举全家之力,才能解决在城市安居和结婚、生育、养育等家庭再生产的一系列问题,这导致有限的家庭资源只能优先向下配置,其结果是,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为严峻。概言之,过去农村养老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中的反馈模式,父母年轻时抚育小孩,小孩长大了赡养老人。但现在的老年人,年轻的时候抚育了子女,年老后其子女却因为要支持孙代而无法有效履行赡养义务。

有效应对“一老一小”问题,是解决农村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前提。在“一小”的问题

上,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当前,大多数农民家庭进城,主要落脚在县城。但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地方政府往往将县域城镇化当作土地财政的杠杆,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配置吸引农民进城,但农民却因收入有限、房价较高而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减少农民的进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配置的公平性,从而降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成本,很是关键。

在“一老”的问题上,关键是要激发农村的制度优势。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存在一种“自养秩序”,即低龄老人通过简单的农业劳动以及积蓄,再加上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基本上能够自我解决生活问题。这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以及这些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今后,乡村治理的重心应该是建立更为完善的养老服务系统,如村级组织要积极构筑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体系,为留守老人搞好服务,让农村成为“低消费、高福利”的退养之地。

各抒己见

乡村发展关键还是要做好“产品”

□乡漫

粮棉油薯,肉禽蛋奶,果蔬茶菌,水产品,特色农产品,都是产品,这就是说乡村产业就三句话,一是如何赚钱,二是怎么做产品,三是如何分钱?

赚钱,产业振兴离不开产品支撑。乡村振兴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让老百姓有尊严地在家门口赚钱。你不赚钱,你哭哭啼啼是没用的,市场不相信眼泪,有产权才有人权、有实力才有魅力、有作为才有地位、有势力才有道理、有活干才有活力、有事情才有事业。

做产品,老百姓要赚钱一定要有产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文旅产品,不管是卖产品还是为产品服务,卖风情、卖文化、卖过程、卖体验都是卖产品,没有产品绿水青山就变不了现,金山银山需要一大堆产品来建成。

分钱,乡村运营要有现代企业思维。赚钱之前先想明白怎么分钱,乡村发展必须要清晰产权,明白不同群体的各自需求,建立好现代企业思维的分配机制,才能保障长远可持续发展。